

# 从泾渭分明到唇齿相依：历史人类学脉络下的 学科跨越与合作

王军杰<sup>1,2</sup>

(1.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084; 2. 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 北京 100081)

**摘要** 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观照的传统旧曾有之, 尽管其间不乏断裂与隔阂, 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跨越学科理论分野的历史人类学日渐为学人所关注。本文通过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关怀、研究进路、书写方式等方面的梳理, 试图勾勒出目前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态势, 并在此基础上倡导“跨学科”与“去学科”的开放理念与心态。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进路, 理应以超越学科圆限为动力之本, 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基轴纳入同一结构内描绘与理解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 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历史以及彼时的社会结构。

**关键词** 历史人类学; 结构; 意义; 实践; 田野; 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 C9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14)03-0067-05

历史人类学, 某种程度而言, 是学术反思在学科对话上的结果体现。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观照的传统旧曾有之, 尽管其间不乏断裂与隔阂。但通常认为, 在西方学术发展历程中, 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真正对话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 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在曼彻斯特作了重要报告, 报告中要求人类学家以历史学家为师, 原因是历史学家在分析研究历史文献方面较有经验, 能把握时间和变化。<sup>[1]</sup> 1968年, 路易士创刊《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 成为历史人类学问世的典型标志。继而, 由若干有益知识块茎组建而成的历史人类学日益蓬勃。萨哈林斯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一书中将当代人类学的“结构”、“事件”、“实践”等核心概念与布罗代尔的“长时间”概念完美结合, 引发了诸多围绕本体论、认识论层面上的探讨与发声, 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推至巅峰。

## 一、“合作”与“复交”的产物

关于历史人类学, 国内众多学者一度智力投资的核心在于其学科范畴问题。此问题的纠结与学科生存策略不无关联。事实上, 不论是史学脉络中的回溯, 还是人类学脉络中的梳理, 都清晰无疑地表达出一个基本事实: 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内在逻辑与学科特色决定了二者的对话与整合是必然更是必须。或许用戈德利耶的一句话来陈述其理由至为恰当——“任何一门社会科学, 不论是人类学, 还是经济学, 抑或是社会学, 都没有办法单枪匹马地凭借一己之力解释完全他所研究和关注的社会”。<sup>[2]</sup> 因而, 我们在背负各自自身“家法”前行的同时, 跨越学科理论视野以及方法论的界限, 对于我们更准确地认知世界、社会不无裨益。这不仅对于历史学与人类学是如此, 同样还适用于其他学科, 甚至于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这是我们在进行历史人类学的学习与讨论中所应形成的最为基本的智识。

(收稿日期) 2013-12-01

(作者简介) 王军杰(1982-), 女, 山东蓬莱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11级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研究方向: 历史人类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萨哈林斯在进行历史人类学表述时，明确表达出历史人类学所应借鉴的人类学“家法”中始终秉承的深层次理论观照以及历史学中的“事件”分析。“实践已跨越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间的界限与理论划分。二者都有了研究层面上的转向，人类学家不再执著于抽象理论的探究，而愿意去具体的实践中找寻答案；历史学家也不再热衷于孤立特别的历史事件，而开始探寻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结构。”<sup>[3]</sup>于此，张小军曾总结“在萨哈林斯看来，历史人类学就是倡导这样一种人类学：它是一门广阔意义上的综合性学科。换句话说，历史人类学是这样一种方式的探究，它力图在不同理论支撑、不同分析工具、不同时空范围之间架设桥梁或形成对话。”<sup>[4]</sup>

当然，学科的跨越整合是需要沟通基础的。对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共通之处，萧凤霞曾经在一场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的对话中将其总结为：一是都以“他者”为研究对象，只不过以往历史学研究的是不同时间中的他者，人类学多半选择不同地点（田野点）开展研究；二是都关注“语境研究”；三是都与文学理论相关，都涉及“书写”的问题。<sup>[5]</sup>在此基础上，历史学与人类学联袂出场，形成了对人类社会思考的新的研究进路。

## 二、“结构”、“意义”与“实践”： 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关怀

自历史人类学提出之后，很多与历史相关的研究都被纳入到这一知识体系下，其中不乏简单的“历史堆砌”之作。从根本意义上讲，此种浮于表面的研究路数尚不足以被称之为历史人类学。这就涉及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关怀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与法国年鉴学派那场与“历史”有关的论战之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中便增添了精神性与心态经验的维度，来解释“政治大事与大人物”的记载及其他形式的书写。<sup>[6]</sup>列维-斯特劳斯论战的影响远不止如此，他的“结构主义”理论这一堪称“20世纪最富原创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范式”为后来历史人类学“发掘历史背后深层结构”理论关怀的形成带来的启发更巨。“结构”理论指出所有的神话、婚姻习俗、图腾制氏族等种类纷呈的文化现象都是

有结构性的产品，这背后必然有某些规则深藏，透过它们就可找出这些现象共有的联系，使其变得容易理解。历史也不例外。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明确提出利用“结构”这把“钥匙”，解决长时段研究中的问题，他把“结构”看作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相当固定的关系。<sup>[7]</sup>已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体或是集体行为以及历史进程的深层“结构”理应成为历史人类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关怀。历史人类学家们怀着共同的兴趣以及从历史中找回社会结构与秩序的普遍心愿，开始了更为深刻的研究历程。

勒华拉杜里的得意之作《蒙塔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这种理论关怀，其引用《奥义书》的一段比喻发人深省：孩子们通过一团泥、一块铜甚至是一把指甲刀便可以了解到所有泥塑、铜器以及铁器的本质，其不断改变的只是形式和叫法而已。<sup>[8]</sup>无论是“铜”、“泥”还是“铁”才是文化（抑或是历史）背后深层次的无意识结构所在。不论我们将其打造成何种模样，都摆脱不了其生而为之的本质。而一旦其与其他物质发生了化学反应，那么打造出来的所有事物都将会因此而改变。历史人类学要做的正是从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发掘出那无意识之存在。

对“意义”的找寻同样是历史人类学试图表现的理论关怀。格尔茨象征人类学的核心在于文化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意义模式，我们需要在符号中“发掘意义之网”。而这些见解赋予了历史人类学新的理论使命，那就是从常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从而更加精准地再现人类历史的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事实上，很多历史人类学家们都在或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像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就是这样的一次学术实践：从18世纪法国印刷工人集体屠猫事件出发，用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分析了18世纪的法国人对猫所赋予的各种意义和隐含在屠猫行为中的象征性仪式和独特文化解读，继而落脚于当时法国人的思考方式。<sup>[9]</sup>值得一提的是《屠猫记》中不仅有着在历史表象背后寻求解释的理论诉求，还试图挖掘行为背后的动机——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恨意。这与《蒙塔尤》中对于“动机”的关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诸如戴维斯的《马丁·盖尔返乡记》以及孙江的《太阳的记忆》等也都包含着在文化所提供的网络之内，透过思考而学习对种种感受进行分类并了解事物意义的学术旨趣。

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中，对于帝王史、精英史以及重大事件史的兴趣日渐消弭。对应地，他们更多地将研究视角投向社会的底层，投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民间风俗习惯等看似“琐碎”的事件。有人将其称之为“眼光向下的革命”。那些无文字的、小规模、封闭的社会与人民的历史进入到了历史人类学的关注视野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学关注“异文化”、“他者文化”的传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种视角的转换体现了对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普通民众的关怀，以及从看似芜杂琐碎的“下层历史”中揭示出重大历史命题的学术理想。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提及“我们再也无法仅仅满足于只书写一种‘胜者为王’的历史，或者只满足于书写被支配族群的历史了。社会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已经表明，普通大众虽然确实是历史过程的牺牲品和沉默的证人，但他们同样也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因此，我们必须发掘‘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历史——‘原始人’、农民、劳工、移民以及被征服的少数民族群的鲜活历史。”<sup>[10]</sup>无论是那些拥有发达文字书写历史传统的人群，还是那些被剥夺了“发声权”的边缘人，皆为历史之主体，都在全球史构建过程中发挥了无法抹杀的作用。着力发掘弱者和他者的历史、凸显历史主体——人——的能动作用成为历史人类学无可推卸的学术责任。

### 三、“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进路

传统史学中，围绕史料开展各种形式的考证是其方法论的核心。而人类学得以安身立命之“田野调查”则为历史学获取“新史料”提供了新的路径。“历史田野”成为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倚仗的重要“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中，历史人类学家将过去看作可与之对话、可加以诠释和解读的活生生的世界。于是“历史现场”频频出现在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工具概念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过程中，格尔茨“厚描”（deep description）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应用。他们不仅仅着眼于对

“新史料”的发掘，不再单纯地记录“眨眼”的表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试图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发现隐藏于表象背后的意义与运行规则。像前文曾提及的《蒙塔尤》以及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都是关注地方小社区（村庄）而成就的得意之作，在研究路径上亦都借鉴了“田野调查”与“厚描”的手法，从细微具体的层面去展现历史真实，并且注重对历史展演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深入解读与阐释。

论及此，势必要观照一下那些以宏大历史建构或是一般历史问题研究见长的历史学者的质疑，即：小型区域（村庄）“碎片化”研究有何意义？这个问题张小军曾经以“滴水见海洋”来予以回答，他同时也强调了这正是历史人类学家们在进行小型区域历史研究时所必需始终坚持的学术目标。从表面上看，也许只是一小片区域，也许只是一个村庄，又或者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只要能够做到“研究小地点、关注大问题”的学术诉求，做到微观与宏观的有机对接，即便是看似再微不足道的小小事件依然能够彰显出“大历史”的实践轨迹。近年来以提倡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的华南学派如萧凤霞、科大卫、武雅士、陈春声等，都把研究目光聚焦在一个乡村，或者将注意力“集束”在一个文化地带，却又在研究整体上构成对华南地域社会的深入探讨。

历史人类学家进入田野的途径是多元的，其中极为突出的便是口述史的研究。尽管其“真实性”、“记忆有限性”以及“伦理”问题为很多传统史学家所诟病，但口述却能在现场和联想中让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这个有些类似于美洲霍皮人（Hopi）的思维模式。霍皮人会将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按照其与自身位置的距离远近来区分时间上的先后，事件发生地点离自己越近，他们便会将其视为越早发生。<sup>[11]</sup>口述史的时空交汇功能亦是如此。但任何技术手段都不可能善尽善，相较于“躲在楼阁成一统”的传统治史方法，口述史料以及获得口述史料的相关技术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说至关重要。除了简单的语言表达之外，参与其中的口述者与倾听者、选择的时间、地点与周围的环境，都会影响口述资料的获取，从而形成不同的对历史的理解。当然，获取口述资料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分寸的把握对于资料的获取以及后续的研究

影响颇深。在此问题上，美国口述史学家史特斯·特凯尔的《艰难时世：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史研究》以及威廉斯的《一个英国村庄的社会学：高斯福斯》为我们提供了范本。

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中，“过程—事件分析”亦是得到广泛关注与应用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过程—事件分析”意即：在多种纷繁的事态中选出特定的事项，将其归属为一个“事件”的主体性行为加以分析。不仅如此，更需对事件背后隐含的意义以及理解事件的方法进行解读。恰如上田信撰文所言“‘事件’是外部给解读者提高理解力的一道练习题，摆在面前的‘事件’是限定的存在，读者必须对‘事件’背后隐含的构筑‘事件’的理解方法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并认识到其局限性。”<sup>[12]</sup>人类学作品《被展示的尸体》正是基于这一学术旨趣写成的，由一个具体的“事件”——河南农民蔡发旺的自杀入手，结合类型学的分析，将事件与过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项进行叙事性再现和动态关联分析，以揭示蕴含其中的深层逻辑。

当然，我们绝非认为上述几种研究进路便是历史人类学的全部，只是择其主要而述。在一个学科共融趋势日益显著的今天，学科间以及学者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是广泛而密切的。方法论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不论其为何，最终能够实现我们认知与理解人类社会这个共同的学术目标乃是关键之所在。

#### 四、历史民族志：历史人类学的文本书写

在人类学领域，民族志（ethnography）被视为“跨越不同体裁与学科的混合文本活动”。<sup>[13]</sup>在广义上看，其不仅涵盖了对不同的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思维心性、制度体系以及文化创造等进行研究的文本，亦被视为研究方法层面上的学术表达。在人类学史上，传统民族志写作范式的最终确立，是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直至后现代理论的兴起，批评之声纷至沓来，并引发了人类学领域一场声势浩大的“写文化”大论争。批评的重心集中在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以及“科学性”等问题上。温森特·克拉潘诺把民族志学者描绘为像赫尔墨斯般的诡术家——保证不撒谎，但是绝不保证会说全部的真理。

历史民族志与传统民族志的最大不同是加入了“历史感”，从而注入时间概念和历史意识。其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达及上述目标：第一种是将无文字民族之历史与西方史学放置到同一框架中进行比照研究；第二种是以结构主义和象征符号为方法论来分析和展现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第三种则是通过研究现实社会中存在和维系的权力关系来窥探本土历史话语在建构历史认同和集体记忆上的作用。<sup>[14]</sup>张海超等亦曾撰文论及历史民族志：其以文献古籍和田野材料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者的参与研究来获取对某个特定地区特定历史时期的洞见，并最终民族志书写形式展现成果。<sup>[15]</sup>它不仅具有历史学的研究视角与路径，更着眼于对社会结构的人类学分析。

历史民族志的书写，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民族志“历史感”相对缺乏的不足，但同样会面临民族志写作危机。恰如克利福德所言：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有承诺的，不完全的。但我想这并不影响历史民族志作为一种历史的表达，只要在书写过程中始终抱有“追求真实与客观”的心，坚持微观世界与宏观层面的有机结合，同样能够贴近历史的真实状态。此时，墨菲的话应该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在所有的文化研究中——其实在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中也是如此——都注定要漫染我们的主观因素，人类学民族志的描写其实无法达到超然的客观性。<sup>[16]</sup>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感到沮丧，带有个人色彩并不是罪恶，只要我们时刻清醒地知道我们田野中存在的个人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立场观点。

#### 五、余论：关于历史人类学

首先我想明确的是，关于历史人类学学科争论的问题，本人非常认同张小军先生的看法，即：历史人类学就目前的发展进度而言，在国内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sup>[17]</sup>我们倡导“跨学科”与“去学科”的开放理念与心态，这种兼容并蓄式的综合方法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未来人文学科的研究趋向。但是，显而易见，学科的跨越并非易事，徒有表面上的拼凑、结合充其量只是在人类知识生产的道路上多挖了几个毫无意义的“树坑”。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进路，理应以超越学科圈限为动力之本，将历时性（diachronic）与共时性（synchronic）基

轴纳入同一结构内描绘并理解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而非仅仅在学科的交集处轻歌曼舞。

毫无疑问,历史人类学不论是对人类学而言,还是对历史学而言,都是一个好的开端。我

们没有理由不为人文学科内这样的“联袂出演”而放声喝彩。但是,我们更需清醒地意识到历史人类学所应肩负的理论关怀,切莫将其变成一件由若干种颜色碎布拼凑而成的“百衲衣”。

#### (参考文献)

- (1) [法] 勒高夫(姚蒙译). 新史学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7.
- (2) [法] 莫里斯·戈德利耶. 社会人类学产生于西方, 就离不开西方么? [A]. 人类学的趋势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81.
- (3) [美] 萨哈林斯(蓝达居译). 历史之岛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91.
- (4) 张小军. 历史人类学: 一个跨学科和去学科的视野 [A]. 清华历史讲堂初编 [C].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361.
- (5) [美] 萧凤霞, 包弼德等. 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J]. 文史哲, 2007 (5): 10.
- (6) 王铭铭. 走在乡土上——历史学札记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09.
- (7) 蔡少卿. 再现过去: 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25.
- (8) [法] 勒华拉杜里(许明龙等译). 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尼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81.
- (9) [美] 罗伯特·达恩顿(吕健忠译). 屠猫记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1.
- (10) [美] 埃里克·沃尔夫(赵丙祥等译).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
- (11) [美] 本杰明·李·沃尔夫(高一虹等译).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31-33.
- (12) [日] 上田信(王晓葵译). 被展示的尸体 [A]. 事件·记忆·叙述 [C].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181.
- (13) [美] 詹姆斯·克利福德(高丙中等译). 导言: 部分的真理 [A]. [美] 克利福德, [美] 马库斯编.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55.
- (14) [美] 乔治·E. 马尔库斯, [美] 米开尔·M. J. 费彻尔(王铭铭等译).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试验时代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136-154.
- (15) 张海超, 刘永青. 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 [J]. 云南社会科学, 2007 (6): 43.
- (16) [美] 罗伯特·F. 墨菲(高丙中等译).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17) 张小军. 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历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 [J]. 历史人类学, 2003 (1): 20.

## From Clear-cut Distinction to Interdependenc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WANG Jun-jie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2. Department of Academic Affair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raditionally,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were in some way related, though there were constant fractures and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 two. But since the 1960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developed from inter-discipline theory has aroused more and more concerns among scholars.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trend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summarizing theoretical concerns,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writing styles. It also advocates an open concept and psychology of inter-discipline and de-discipline.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pproach,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hould surpass the limit of discipline by describing and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facts in bot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so as to provide a more thorough description of historical and present social structures.

**[Key word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tructure; meaning; practice; field; ethnography

(责任编辑 路辉 徐姗姗)